

長安學術

第五輯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編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長安學術

松林題

第五輯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編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安学术. 第5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10512-5

I. ①长… II. ①陕… III. ①长安(历史地名)—文
化史—文集 IV. ①K29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000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长安学术

(第五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512-5

2013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16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9

插页 2

定价:80.00元

《长安学术》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名誉主任:霍松林

编委会主任:李西建

编委会副主任:张新科 邢向东 刘生良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尤西林 王 荣 韦建国 邢向东 刘生良 刘峰焘 李 强
李西建 李继凯 张新科 周淑萍 胡安顺 赵学勇 赵望秦
党怀兴 高益荣 程世和 霍有明 霍松林 魏景波

名誉主任:霍松林

主编:李西建

副主编:张新科 邢向东 刘生良

本辑执行主编:赵学勇 李继凯 王 荣 田 刚

目 录

[延安文艺本体研究]

程春梅:延安文学中的贞节观	(3)
方维保:延安文艺运动与价值观的调适	(13)
李林荣:重述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的延安文学	(20)
潘 磊:鲁迅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	(27)
惠雁冰:“延安文艺”的研究现状与亟须突破的几个问题	(36)
黎活仁:卢卡契福本主义对中国文艺政策的影响	(43)
张 勇:性别与民族国家想象 ——以解放区文学为例	(53)
[日本]濑户宏:试论延安“大戏热”	(62)
李继凯: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	(73)
李 振:从苦难书写到被动翻身 ——1942年后延安文学中的妇女解放	(85)
梁向阳:由《高干大》看“延安文艺”的转型之路	(95)
卢洪涛 杜 静:论延安文学的大众启蒙内涵	(103)
倪文尖: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 ——《邪不压正》为例	(116)
徐明君:延安文艺传统与鲁艺知识分子	(126)

杨洪承:空间视域中的 20 世纪延安文学的再认识	(131)
杨 琳:延安时期纪实文学:记录历史现场的新闻文学文本	(142)
谭诗民 李西建:延安文艺对马克思主义	

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影响	(152)
------------------	-------

徐仲佳:艰难的“脱胎换骨”

——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的细读	(162)
-----------------------------	-------

张永东 汪 洁:论延安文艺代表作品的经典化历程

——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例	(174)
---------------------	-------

钱章胜:延安整风与“启蒙”
 (182) |

王贵禄:大众化问题:从左联到延安
 (189) |

[延安文艺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陈思广:一“定”一“出”之间

——柳青《种谷记》与《创业史》的接受研究	(205)
----------------------------	-------

王俊虎:论陕西文学对延安文学的承传与发展
 (213) |

吴 进:柳青与革命文体的生成
 (225) |

魏 巍:重复与替补

——论解放区小说与十七年小说的大团圆意识	(239)
----------------------------	-------

江腊生:知青写作与农民工书写

——延安文艺的两种结缘方式	(249)
---------------------	-------

李 军:土改中的身体叙事

——解读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电影《暴风骤雨》	(258)
----------------------------	-------

林 震:从甲长到村长

——中国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乡村权力书写	(265)
-----------------------------	-------

张炼红:从“新秧歌”到“样板戏”: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的

历史脉络与影响	(272)
---------------	-------

阎浩岗:重论“高于生活”及“理想人物”塑造
 (284) |

编后记	(298)
-----------	-------

延安文艺本体研究

延安文学中的贞节观

程春梅

摘要:延安文学中的贞节观在延安文艺整风前后的表现是不同的,总体来看,整风前我们能从文学中看到作家对工农兵为主的延安社会中的贞节观陋习进行批判的表现,但整风之后延安文学往往变成了对延安婚姻政策的赞歌,贞节观趋向于新的描写形式,作家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对私人情感的描写,贞节观更多地趋同于其服务的对象,即文化水平较低的士兵与农民。

关键词:延安文学;贞节观;禁欲主义

贞节观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儒家道德对女子最严明的约束就是“贞节”。贞节观包含了很多与婚姻、生育、爱情与性相关的对女性实行控制的内容,比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女不事二夫”等,其最极端的表现便是旌表贞节女性的“贞节牌坊”和给予女性极大痛苦和束缚而令很多男人迷醉不已的“三寸金莲”。尽管“贞节牌坊”和“三寸金莲”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受到激烈批判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要求女人守贞节的思想观念却并非靠一场运动便能消除的。在20世纪的中国,贞节观始终作为潜意识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些表现也都无疑地在各时期的文学中有所反映。坦娜希尔在她的《历史中的性》中认为:“在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之时,权力阶层就已经发现,通过约束两性关系,有可能控制家庭,从而有效地保证国家的安定。政府官员就像征税者一样,要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模式就会心神不安。即便如此,仅就他们要涉及公众关心的领域——合法、继承权和人口控制——而言,他们也必然会干预两性关系问题。中国是这样,印度是这样,古代近东也是这样。在法律义务之外,性的道德即是人类关系的道德。”^①坦娜希尔的分析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对贞节观做的一个注脚,直白地说,贞节观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是政治对性的规训。一个社会的开明程度如何,可以通过其贞节观反映出来。从贞节观的角度研究延安文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延安时期政治与革命如何在对性的规训中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调控。

^① [美]坦娜希尔著,董仁译:《历史中的性》,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

延安文学时期,文学成为一种宣传革命的有力武器,而作家经过锤炼特别是经过延安文艺整风之后接受了这种观点。延安文学中的贞节观在延安文艺整风前后的表现是不同的,总体来看,整风前我们能从文学中看到作家对工农兵为主的延安社会中的贞节观陋习进行批判的表现,但整风之后延安文学变成了赞歌,贞节观趋向于新的描写形式,在政治的深刻影响下文学观念和社会观念也都倾向于革命与抗日,与五四文学时期相比较变化非常显著。虽然在左翼文学中爱情已经开始给革命让路,左翼文学中已经有了共产党的工作领导,政治对文学的规训早已启动,文学已经不是在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进行,但毕竟左翼作家是在一定的自由状态中从不同角度来描述私人情感、性和爱情的。在整风之后的延安文学中,为了配合政治,做好革命与战争形势下的宣传工具,作家们在毛泽东延安讲话的推动下小心翼翼地处理对情感主题的描述。所以,情感或者说性的问题在远离政治的表面现象下实际上控制了作家们的创作,作家们要绷紧了神经回避情感或者说性的问题,性被阶级、民族、国家这些政治话语所压抑。作家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对私人情感的描写,贞节观更多地趋同于其服务的对象,即文化水平较低的士兵与农民。

一、前期延安文学中的贞节观

应该说,延安文学开始时的主体作家是来到延安的左翼文学作家,左翼文学的突出特点是其现实主义手法和批判性,丁玲初到延安后的作品便体现了这种特征。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丁玲发表的《韦护》《一九三〇春上海(之一)》《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三部小说都是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识分子为典型,描写他们在大潮流冲刷下的政治态度、思想感情的变化与对立,从这三部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爱情对于革命者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的感情,凡是妨碍革命事业的爱情都要走开。而这也隐约地显示了革命对性与爱情有效规训的端倪。革命鼓励人们放弃卿卿我我的小资情感,鼓励人们踏上为大众解放的革命征程。也就是说除非是有志同道合的革命理想,否则革命者就不该有所谓个人私情。这是丁玲服从革命的大趋势所进行的创作上的调整,她已经从早期的义无反顾的莎菲女士的叛逆中走出来,开始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进行文学创作。到达延安以后,体现在丁玲作品中的革命气息更为浓厚,但作为一名著名的左翼文学家,丁玲仍然保持了她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1938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中的男女比例为30:1,1941年前后这个比例是18:1,

到1944年初男女比例是8:1。^①如此悬殊的两性比例给人们解决婚恋问题造成了现实的困难。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二五八团”“三五八团”的对结婚资格的规定,^②出现了“一个科长就嫁了”的讽刺画,^③还出现了因恋爱不成而枪杀女友的“黄克功案”。在这种情况下由丁玲担任主编的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些反映延安现实生活存在的所谓阴暗面的作品: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杂文。在此之前,王实味已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指出由于各自任务的不同和观察问题着眼点的差异,政治家和艺术家就会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弱点,因而必定会产生矛盾与分歧。他希望政治家和艺术家都能各自尽责,共同完成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历史使命。这些文章反映了作家对于延安生活中的某些缺陷的不满和意见,对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等级制度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作品引起了高层某些领导人的恼怒,同时国民党又把其中某些作品当作反共宣传品大量翻印传播,对延安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延安召开了批判声讨这些批评者的各种会议,王实味则被逮捕,后来竟被处死。文艺整风运动让丁玲和延安的作家们在精神上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让他们转向为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需要的党员作家。丁玲在整风运动中发表文章讨论毛泽东讲话时写道:“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文艺是政治的一个环节,我们的文艺事业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问题必定首先为我们的作家明确而肯定地承认。”^④“立场不能解决艺术以内一切问题,但它解决主要问题。”^⑤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后,丁玲又被送往中央党校学习和参加审干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接受锻炼和改造。此后她深入到边区的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写了大量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宣传作品。

丁玲原载于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的《“三八节”有感》描写了延安的女性在婚姻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困惑。实际上在解放区,对于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主的宣传是一种真实存在,但在革命队伍中,另一种情况也是真实存在的,那就

①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② 早期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组织纪律来约束。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二十五岁,八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双方男女必须是党员,且有三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五十岁。

③ 1942年春,华君武与蔡若虹、张谔三人在延安开了个讽刺画展。其中一幅漫画叫《首长路线》,画的是两个女同志在路上聊天,一个说:“才一个科长你就嫁了。”讽刺的是当时风行的“谁的官大就嫁谁”的择偶标准。这个漫画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④ 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陈明编:《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延安作品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⑤ 同上,第267页。

是领导和组织出面来实行的介绍婚姻。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各种革命回忆录以及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比如近年热播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表现出的就是领导喜欢上了姑娘而成就的婚姻)。“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①“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②“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③“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需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④女人们虽然被标榜着跟男人平等,可是面对婚姻与爱情,她们中许多人实际上仍然很难自主,在解放区文学中,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三八节”有感》是唯一给予关注与同情的作品。所以由此也可看到,初到延安时期的丁玲在最初还保留着她一贯的独立思考的心态,她因为写《“三八节”有感》而与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在文艺整风中受到严厉批评,但也因为她写的《“三八节”有感》,让我们能够从中对丁玲的不同凡响的真诚与悲悯情怀窥见一斑,使她有别于那些单纯的革命宣传。

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也是丁玲在延安的早期作品,延续了丁玲带有精神分析特征的私人情感和情欲表达的个性,透着一种直面真实的敏锐目光。小说描写了一位被日军抓住轮奸后又被强行拉了做随营妓女的女主人公贞贞的故事。理论上说解放区应该是妇女获得真正解放的地方,可是现实却不是这样,封建思想对“贞节”的道德评价继续维持着对妇女的压迫。身为女性作家,丁玲同情小说的女主人公,可作为革命者,她又不能否定革命大众,因此虽然最后的结局是贞贞坚强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离开故乡踏上革命道路,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但仍然有一种压抑的气氛弥漫

① 丁玲:《“三八节”有感》,陈明编:《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延安作品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52页。

② 同上,第252页。

③ 同上,第253页。

④ 同上,第254页。

在作品中,也导致了她的这篇小说解读的复杂性。贞贞虽然不幸因为反抗包办婚姻而在逃走的路上被日本人抓住做了妓女,但她积极帮助游击队送情报,表现出优秀的爱国情操。可是后来离开日军回到村里治病时,却受到了在传统贞节观念支配下的村人的冷漠对待,杂货铺老板说:“她那侄女儿你看见了么?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踏的呀,”“亏她有脸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①女人则议论说:“那娃儿向来就风风雪雪的,你没有看见她早前就在这街上浪来浪去,她不是同夏大宝打得火热么,要不是夏大宝穷,她不老早就嫁给他了么?”“还找过陆神父,一定要做姑姑,陆神父问她理由,她不说,只哭,知道那里边闹的什么把戏,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②这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③。但是贞贞这个坚强的姑娘遭受了来自敌人和亲人的双重打击却没有沉沦下去,她拒绝了恋人要顶着舆论压力娶自己的请求,决心离家寻找新的生路。被鬼子糟蹋过,别人和贞贞自己都认为贞贞已经是个不干净的人了,但是贞贞在忍受了太多非议和鄙视之后,最终以走上革命道路的方式来抚平感情的创伤。这种写法,仍然在延续着左翼时期的基本模式,但丁玲的不俗之处就在于,贞贞具备了丁玲式主人公的那种不屈不挠地面对挫折的勇气,那种倔强与尊严感使我们看到丁玲从莎菲时代就有的对传统礼教观念的警惕与抗拒。我们也能够从中感受到丁玲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对于笔下的女性主人公所具有的深切的基于理解的关怀之情,能够看到丁玲不变的对传统贞节观挑战的姿态,她的那种秉承了五四个性解放传统的精神之光时时闪现在冷静的描述中。这一切都使丁玲在所有的延安作家中显得更独特,体现了她一贯的个性风采。

丁玲在延安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夜》等都显示出她的关注点和思考角度的与众不同,敏锐的丁玲在写作中没有掩盖解放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与革命气氛不合拍的阴暗面,但她能以革命者的自觉把这种对阴暗面的表达限定在某种程度,总是会峰回路转地指出革命的出路。贞贞的因革命而将获得新生是如此,《在医院中》的陆萍也是如此,陆萍跟郑鹏多接触一些就被议论,谣言满天,说她是在搞浪漫,谈恋爱,而指导员也相信了谣言找她谈话,让她不要为了恋爱妨害工作,但最后陆萍还是申请再学习,怀着充满希望的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奔向新生活。小说《夜》中,丁玲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了村指导员何华明在夜色中对地主的女儿清子和

①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陈明编:《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延安作品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② 同上,第216—217页。

③ 同上,第223页。

对妇联委员侯桂英的性爱欲望,但后来何华明对异性欲望即将要得到发泄时却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干部”身份,从而克服和放弃了自己对欲望的追寻,最终服从了革命大局的需要。这是延安文学中仅见的体现革命者情欲的小说,但是这样的描写已经与丁玲早期自由奔放的创作不可同日而语,它更多地体现着革命对情欲的压抑,革命者不再是因爱情而意气风发的青年,而是收敛情欲、肩负革命使命的中年人。但尽管如此,丁玲的《夜》这样的作品在延安文学中仍然是一个异数,因为在大部分的延安文学中,革命者的形象是远离情欲的,是不会出现这种心事重重之犹疑状态的描写的。接受了延安文学规范的丁玲并没有放弃对复杂人性的诚实描写,所以才会有何华明这样的革命者形象出现,这表现了丁玲在延安文学中的独特之处。

真实表现延安婚恋生活的还有马加发表在《解放日报》的小说《间隔》,小说中与队伍走散的县救国会女干事杨芬遇到了支队长并被支队长看中,支队长迫切希望能与杨芬结婚,许诺给她安排轻松的工作,对她大献殷勤,不顾杨芬已经有男友的事实,委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代表组织做说服工作,实际上是希望以组织的权威来迫使杨芬就范。而杨芬的男友周琳在支队长的强势面前表现懦弱,自知无法与支队长竞争,因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平凡的他不能给杨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接受支队长的杨芬忍无可忍,在这种貌似阴谋的求婚面前感到身心俱疲,心怀恐惧,最终一个人逃离了支部。在小说中,马加将支队长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获得女性的青睐所施展的手段展露无遗。但这部小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了报社里树立的批判的靶子,而报社也因发表这部小说写了检讨。早期延安文学中作家的创作是比较多地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的,对于披着革命外衣执行封建贞节观的做法采取的是批判态度。但经过延安整风之后,批判的声音便基本消失了。

二、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贞节观

延安文艺整风后,延安文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是文学中的个人情感、爱情描写几乎消失,普遍地出现了不谈感情的创作状况,另一方面则是热烈歌颂党的婚姻政策带给人们的幸福生活。这实际上体现的是延安作家们已经接受了新确立的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原则,他们告别了小我,开始学着进行宏观叙事,采用乐观积极的态度来面对集体的事业,做好舆论宣传的工具。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组织文艺通讯团奔赴东北。后因交通阻断被滞留在张家口地区,以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最基层的土改运动。正是在

土改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随后她就开始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从1946年秋天开始,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到1948年的夏天,小说终于修改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贯彻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成果。在这部作品中,丁玲把阶级敌人的形象塑造得丑陋不堪,比如写李子俊的女人,她的面相就是丑陋的,善于伪装,耍两面三刀的伎俩,而写正面形象时则采用另外的美化方式,比如写黑妮就写她的美丽,甚至为了写出黑妮与程仁的革命爱情的合法性,她把真实中原型是地主女儿的黑妮写成了地主钱文贵的侄女,成了贫穷的佃农的女儿,对地主叔叔充满了不满,这样就使他们出身于同样的阶级,他们的结合顺理成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在现当代文学史编写中一直被认为是丁玲的重要作品,是延安文学的典范之作,它还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文学奖,但我们从中看到的则是丁玲大踏步地接受了延安文学的规范,不再显露她一贯张扬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风采,个性追求淹没在了革命规训爱情的延安文学的洪流中。

赵树理与孙犁是延安文学中最具乡土特色的两位作家,他们被认为从不同方向实践了《讲话》的要求。《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延安文学中唯一的一篇写爱情的作品,作品中虽然写到小二黑与小芹的恋爱,重点表现的却不是两个人的爱情,而是他们对坏分子的斗争,特别是表现了人民政府在恋爱、婚姻自由中的作用,在这里,革命话语中革命的内容冲淡了爱情的内容。赵树理的主观意图上是要进行宣传,要歌颂新生政权、边区政府的强势足以帮助青年们反抗婚恋不自由的封建陋习,要宣传婚姻法,反对封建迷信,要体现出婚姻自由的幸福美好。但是这部日后影响巨大的作品刚开始的时候出版并不顺利,赵树理把完稿后的《小二黑结婚》交给了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最后因有了彭德怀的题字才得以出版。但是书刚上市,批评的文章就尾随而来,《新华日报》(华北版)刊登文章称《小二黑结婚》只是简单地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恋情,内容过于庸俗化,指责小说作者不去宣传抗日大事情,尽写些儿女情长、没有什么意义的爱情婚姻琐事。甚至还有人批评《小二黑结婚》是海派货色。虽然作品在文艺界遭到了批评和攻击,却挡不住读者对它的喜爱,第一版两万册仍供不应求,仅在太行山区就发行达四万册,后又被上百家地方剧团改编成各种地方戏各处演唱,流传很广。特别是被改编为上党梆子之后,在解放区农村引起了一场真正的轰动,赵树理因此而一举成名。1947年,赵树理生平第一次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因为外国记者发现,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赵树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

但是今天我们细察《小二黑结婚》会发现不同的问题。在《小二黑结婚》里面,作者是将装神弄鬼、整天涂脂抹粉精心打扮的“三仙姑”当作一个作风不正的反面人物来讽刺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十五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

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在国外读者的阅读评价里,《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是唯一一个受到赞扬的真实的爱生活的女人,这与国内的阅读评价差别非常大。实际上在当时的农村里,像“三仙姑”这样的女人的确被认为是游手好闲不道德的人,赵树理反映了这种生活真实,同时也认同了这种贞节评价观念。他按照“反动人物和落后人物都是道德上的腐化分子,阶级敌人都是性不道德者”的延安文学思路,在塑造反面人物“三仙姑”和金旺兄弟时,从“性”的角度把他们归入道德败坏一类。赵树理对“老来俏”的“三仙姑”进行了丑化描述:“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①她为了吸引男人而精心做出的打扮,受到了冷冷的嘲讽,最后得到了“改造”,不再风骚,花衣服和绣花鞋都不穿了。小说在对金旺、兴旺兄弟的描写中,金旺对小芹动手动脚,两兄弟“拿双”将约会的小二黑和小芹捆绑的情节中都体现的是他们的性道德败坏,他们是小说中的反面典型。这种写法一方面表现出赵树理的的小说的确发挥了巨大的教育意义,对促进农村青年婚姻自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者对顽固的性保守的乡村贞节观念的认同。

1948年10月,赵树理的中篇小说《邪不压正》在《人民日报》连载。通过描写女青年软英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提出土改工作中执行政策过“左”的偏向问题。但在当时《邪不压正》被认为是写了土改中的阴暗面,污蔑土改干部,是赵树理第一次遇到猛烈批评的小说,后未收入文集,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又重新发现了它。实际上《邪不压正》所表现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一样,仍然是赞扬为穷人主持公道的新政权和宣传维护婚姻自主的婚姻政策。延安文学中政治对文学发挥着规范甚至决定性作用,一切为了宣传的效果,任何会出现不良宣传效果的可能性都要被剔除,所以小说《邪不压正》被批判的遭遇也是不可避免的。

孙犁作品富于诗情画意,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虽然整个的革命环境决定了延安作家们的题材要围绕着革命工作展开,孙犁也没有离开抗战、土改等现实生活主题,但是现实生活在孙犁笔下却呈现出不一样的美来,有别于延安很多作家在涉及主人公个人生活时往往只反映婚姻中的问题,而回避了对更富有激情的爱情的描写,爱情在孙犁的笔下有着别样的光彩,含蓄又饱满。

《荷花淀》可以说是孙犁的代表作。作品表现了在战火硝烟中农村妇女既温柔多

①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情,又坚贞勇敢的性格和精神。苇庄游击组长水生和村中的几位青年报名参军,明天就要开拔了,他回来向妻子说明情况。水生嫂是一个传统、善良的农村家庭妇女,得知丈夫要离家参军,她虽然心里为难,但还是支持丈夫的选择,是非常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对丈夫的这份感情很诚挚。她独自挑起了家中养老抚幼的生活担子,让丈夫放心去战场。作者写水生嫂等待要离家的丈夫的嘱咐,水生给她的嘱咐是“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那最重要的一句是“不要叫敌人奸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在水生的观念里,抗日这件事是大事,可以抛家舍业不顾生命的安危去做,而女人的贞操也是件大事,大到要不顾生命的安危去保卫。这便是当时农村真实的贞节观状态,也折射出作家孙犁对这种保卫贞操的传统贞节观的认同感。

李季也是一位著名的延安文学创作者。他创作了长诗《王贵与李香香》,1946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是解放区在毛泽东《讲话》发表后实践工农兵文艺方向的第一篇优秀诗作。《王贵与李香香》全诗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格式和手法,以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展现了“三边”人民走上革命的历程。长诗成功地塑造了王贵和李香香这两个觉醒了的青年农民形象,李香香的坚贞性格格外引人注目,她不爱崔二爷的钱,坚决地反抗崔二爷的强娶霸占,只爱那要为穷人解放参加革命的情哥哥王贵。这部长诗的情感表达方式很直白,把热烈的爱情描写得缠绵而又质朴:“大路畔上的灵芝草,谁也没有妹妹好!”“马里头挑马四银蹄,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你!”“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主人公爱情的悲欢离合与革命的发展紧密相关,诗歌传递了革命带给个人婚姻爱情幸福的信息。另一方面,诗歌写革命保证了香香的贞节,在被崔二爷强娶的当天香香就获得了解救,我们知道事实未必这样圆满,但是这样的写法符合工农兵的传统阅读心理,他们谁也不想看到地主玷污革命主人公的贞节,使美好的革命形象蒙受侮辱。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诗人对传统贞节观的维护与坚守,反映了作者对要让文学发挥为工农兵服务的作用,用正面的形象鼓舞士气这样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不成文规则的遵守。

阮章竞的《漳河水》也是积极学习民间艺术形式的优秀长诗,诗歌杂采漳河地区流行的多种民歌、小曲形式以表现不同的思想情绪和气氛,内容丰富、较为成功地吸收和融汇了古典词曲与民歌的艺术优长。《漳河水》通过三个农村妇女荷荷、苓苓、紫金英形象的刻画,真实地反映了太行山区劳动妇女在野蛮落后的封建习俗下的痛苦生活以及她们在新制度下的解放与重生。荷荷、苓苓、紫金英都受着封建包办婚姻的苦。荷荷在婆家受尽虐待,苓苓的丈夫夫权观念很重,她受尽了丈夫的欺侮,紫金英过门不久丈夫就死了,她必须按照“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终身守寡。但是在共产党新政权领导下她们翻身觉醒了,荷荷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与跟自己年龄悬殊的黑心肝的老头